

# 翻译的文明博弈：从汉代到明清之际的知识重构与文化调适

任国沁

昆明理工大学

DOI:10.12238/er.v8i11.6545

**[摘要]** 该研究以中国历史上三个关键时期的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从汉代至明清之际翻译活动在文明对话中的核心作用。研究表明，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行为，更是知识重构、文化调适与权力博弈的复杂场域。通过分析汉代至明初的世俗文献翻译、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以及“西学”概念的文明根源，揭示了翻译活动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促成知识体系的革新与文化的融合，同时展现了翻译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与主体性选择。研究发现，中国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始终采取选择性吸收策略，既推动知识革新，又维护文化主体性，最终形成独特的“翻译—重构—融合”模式。

**[关键词]** 翻译活动；文化融合；权力博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he Civilisational Game of Translation: Intellectu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oqin Ren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aking th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ree key periods of Chinese history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entral role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n 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technical act of language conversion, but also a complex field of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power game. By analysing the translation of secular literature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eastward expan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the civilizational roots of the concept of “Western learning”, this article reveals how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ontributed to the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es the complex power relations and subjective choices behind transl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a has always adopted a strategy of selective absorption in the face of foreign cultures, which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of knowledge, but also safeguards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ultimately creates a unique mode of “translation—reconstruction—integr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ultural integration; power games

## 引言

翻译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跨文化接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从汉代与西域的交往，到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再到对“西学”概念的文明溯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与内在逻辑。本文以三个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如何在不同历史语境下促成知识重构与文化调适，并分析其背后的权力博弈机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理解翻译在文明交流中的核心作用，更能把握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影响时的应对策略与调适机制。

## 1 汉代至明初：翻译与世俗知识的传播

汉代至明初的翻译活动主要表现为外交与贸易驱动的知识传播。汉代时期，随着“通西域”政策的实施，翻译在外交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班超出使西域的活动极大增强了中国对中亚地区的了解，推动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这一时期的翻译人员不仅负责语言转换，更成为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社会动荡，翻译活动却持续推进。不同民族在相互接触中实现文化互补，翻译活动为思想、宗教和社会变迁提供了多样性视角。隋代统一后，裴矩在《西

域图记》中通过采访外国商人来了解西域地理与风俗，这一工作离不开翻译人员的协助。

唐代是中国文化繁荣时期，翻译活动在各个领域均有显著发展。“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互动，翻译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西域音乐、舞蹈和艺术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的桥梁作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翻译人员在与东南亚、南亚及非洲的交流中担当重要角色，促进了贸易往来与文化理解。

这一阶段的翻译活动具有明显实用性特征，主要表现为：

1. 服务于外交、贸易等现实需求；
2. 促进文化融合与互补；
3. 积累关于外部世界的系统性知识。

## 2 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知识重构

明清之际，随着欧洲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大规模接触西方科学、宗教与文化。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新的特点。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和中华的儒教文明开始相互了解并对话的最初动力来自宗教。天主教传教士在这场对中华东方的精神探险中起到了主要作用<sup>[1]</sup>。

徐光启、李之藻等士大夫与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合作时，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优先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实用科技著作，而淡化西方哲学与神学内容。这种选择既源于“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也暗含维护文化主体性的考量。

在翻译策略上，中国学者采用“西学中源”论来调和矛盾。数学家梅文鼎宣称西方天文学源自《周髀算经》，历算家王锡阐则以“熔西入中”的方式修订《晓庵新法》。术语翻译的本土化（如以“四元术”解释代数）也体现了知识融合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活动被纳入政治权力网络。清廷将西学视为巩固统治的工具，康熙命传教士编纂《律历渊源》，借天文学强化“君权神授”；但当西学威胁意识形态时（如“礼仪之争”），清廷立即收紧管控。

中国学者对西学的态度呈现出“实用理性”与“文化保守”的矛盾特征。一方面，他们以开放姿态拥抱实用技术。明末历法失准促使徐光启主持修订《崇祯历书》，引入托勒密体系；王徵翻译《远西奇器图说》，将西方机械改良为中国农具。另一方面，学者对西学的吸收存在鲜明边界。他们拒绝接受可能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的内容，徐光启虽皈依天主教，却坚持“耶儒互补”；《四库全书》将传教士著作归类为“天文算法”，刻意剥离其宗教背景。“西学东渐”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在向全球扩张中面对东方大国而采取的一种略区别于殖民扩张的交往形式<sup>[2]</sup>。

## 3 西学的文明根源与中国的接受模式

“西学”一词的“西”具有明显的地理指向性，其具体

范围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出动态演变。古代地中海世界时期，“西学”的根源起始于希腊城邦与罗马帝国。雅典、罗马和亚历山大城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知识生产中心，产生了对哲学、政治和科学的深远影响。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时期，伴随社会变革，地理重心向西欧转移。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典籍通过西班牙托莱多翻译运动回流到欧洲，促进了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

西学的文明基因根植于三大源流的碰撞与融合：希腊理性传统、希伯来-基督教启示传统和罗马法政实践智慧。希腊传统强调理性与逻辑，发展出数学公理化思维和形式逻辑体系；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以《圣经》的教义、伦理与信仰为核心；罗马法则体现了对普遍主义的追求，为现代法治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对西学的接受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学者们主要吸收希腊理性传统中的实用部分（如数学、天文），而排斥其宗教与哲学基础。这种“技术剥离”现象与明清之际的“中体西用”策略一脉相承。中国学者重视技术成果，却忽视西方科学背后的逻辑演绎与实验精神。《几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译未能引发数学革命，反而被纳入传统算学体系，就是典型例证。“西学东渐”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sup>[3]</sup>。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传教士将中国“龙”误译为“dragon”，导致吉祥符号被曲解为邪恶象征。这种语义错位反映了文明根源差异对翻译的深层制约，也解释了为何中国学者对西学中的宗教意象保持警惕。

## 4 翻译的三重博弈模型

基于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三重博弈”分析模型，用以理解翻译在文明对话中的复杂作用：

4.1 知识博弈：翻译总伴随着知识筛选与重构。汉代选择翻译外交文献，明清选择科技著作，都体现了对知识的选择性吸收。这种选择既受实用需求驱动，也受文化认知框架制约。

4.2 文化博弈：本土化策略是维护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手段。术语改造、“西学中源”论等实践，都反映了文化调适的智慧。通过将外来知识纳入既有框架，实现了“文化安全”状态下的知识更新。当代国际传播的“转化策略”（如语义图解处理）与明清“西学中源”论本质相似，但前者更注重双向对话而非权力主导。

4.3 权力博弈：翻译活动始终受政治权力制约。从汉代的外交翻译到清廷对西学的管控，权力因素深刻影响着翻译的内容与方向。清末“口译一笔述”翻译模式中，传教士主导翻译内容的选择与诠释，本土助手多处于从属地位<sup>[4]</sup>，进

一步印证了翻译活动受政治权力规训的特征。

这三重博弈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知识的选择性吸收服务于文化主体性的维护，而文化调适的策略又受到权力关系的制约。正是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翻译实践模式。

## 5 结论

本文通过考察从汉代到明清之际的翻译活动，揭示了翻译在文明对话中的核心作用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发现：

首先，翻译从来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涉及知识筛选、文化调适和权力协商的复杂过程。中国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选择性吸收—本土化重构—权力协商”的应对模式。其次，这种模式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知识更新，又维护了文化主体性。通过将外来知识纳入既有框架，实现了文化的渐进式变革，避免了剧烈的文化震荡。翻译始终在文明对话中扮演“调停者”角色。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翻译需超越权力单向度，建立双向批判性对话。

翻译作为文明对话的媒介，其价值不仅在于知识的传递，更在于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创造性转化。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跨文化交流的规律与智慧。

## [参考文献]

[1]顾卫民. 西学东渐的历史轨迹[J]. 探索与争鸣, 1995(3): 41-42.

[2]曹亚明. 承续与超越[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8.

[3]全洪爽. 从“天学”的分化看明末“礼仪之争”发生的背景[J]. 国际汉学, 2023(5): 29-39, 155-156.

[4]段怀清. 在翻译中翻译: 清末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关系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5(3): 48-60, 170.

## 作者简介:

任国沁(1999-), 女, 汉族, 四川南充人, 本科, 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